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第五辑

07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广东人民出版社

87
K258.07
1
2:5

4670/32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五辑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广州

B

392581

目 录

- 吴佩孚与西南军阀……………郭剑林 郝庆元 (1)
- 试论孙中山与奉皖结成反直的
“三角联盟”……………张志强 武育文 徐建东 (18)
- 谭延闿执掌湘政的特点……………宋锐乔 (32)
- 熊希龄与联邦制……………周秋光 (44)
- 湖南军阀与“驱张”运动……………成晓军 (64)
- 赵恒惕治湘时期农业经济剖析……………唐苏妍 (81)
- 熊克武与建国联军……………马宣伟 (98)
- 大革命时期的四川军阀……………邹吉川 (112)
- 四川军阀与工人运动……………宋良曦 (127)
- 试析杨森向红四方面军要求“互不进攻”、
“建立联军”的虚伪性……………林 超 (143)
- 护国运动中的军阀龙济光……………高光汉 (152)
- 论驻粤滇军……………孙代兴 (168)
- 唐继尧图川的破产……………荆德新 (187)
- “南北议和”中的唐继尧与刘显世……………邹晓辛 (204)
- 西南军阀与五四运动……………范同寿 (216)

浅论陆荣廷二次兴兵图粤·····	罗重实(230)
新桂系与两广“六一事变”·····	李炳东(244)
陈景华与民初的广东政局·····	王晓吟(260)
陈炯明蜕变为军阀的剖析·····	丁身尊(276)
“联省自治”运动在广东	
——试析陈炯明的“联省自治”	
·····	宋庭通 钟珍维 夏琢琮(291)
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广东建设·····	沙东迅(308)
附录：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第五次学	
术讨论会收到论文、资料	
目录·····	(325)
编后·····	(328)

吴佩孚与西南军阀

郭剑林 郝庆元

一、吴佩孚与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

一九一七年九月，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广东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组成了粤桂湘三省联军，锐意北伐。皖系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盗用北洋政府名义，利用属于直系的王汝贤、范国璋两师兵力“讨伐”西南。南北激战于湖南战场。而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不甘心受制于段、力谋“和平统一”、联络西南，并策动王、范在前线通电“言和”、“罢兵息鼓”，率部撤退到岳州防地。此时，皖系“灵魂人物”徐树铮“联奉制冯”，直皖之隙造成。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冯在段、徐的裹胁下，被迫下“平南令”。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兵分五路大举进攻湖南。吴佩孚是曹锟的心腹爱将，他披坚执锐，一马当先，对南方作战中表现出独具的机智勇敢，始而驱兵疾进，所向无敌，“战功卓著”；继而陈兵不战，通电主和，对时局多有左右。次年，冯国璋死后，吴成为直系的实际首领。

吴佩孚第三师血战岳州、长沙，以破竹之势，连战连捷，直捣衡阳，为时不到三个月，“声誉”大张。段祺瑞大有动用直系为皖系打天下“得不偿失”之感。因为吴佩孚得手湖南，直系就兼有四省（湘、鄂、豫、直）地盘，若再前

进，将无敌于天下。故段急令嫡系张敬尧率领四倍于吴师的兵力（加上原在湘省的李元奎师、田树勋师及范国璋师），以援吴师为名，尾随入湘，以监视和争功，借机扩张皖系地盘，并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

吴佩孚见到皖系厚集兵力，咄咄逼人，无异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为自己的利益计，要保住权势，护持直系根本地盘（久戎于外，根据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将无退路），故认为不可再战，遂决定“罢战主和”。

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亦感自危。他们为排挤孙中山和对抗皖系“平南”，便主动与直系谋和，先向直系苏督李纯表示：“北不攻岳，南不攻鄂”，请“毅力斡旋，促成和局。”①吴佩孚亦与李纯接洽，共谋和平。

一九一八年五月，广东军政府改组，孙中山被逐，南北即开始议和。六月，吴佩孚不经北洋政府同意，擅自发表“请罢内战”的爆炸性、“叛逆性”通电。

二十五日，吴佩孚与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签订停战协定，联合通电称：“此次新国会（指安福国会）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因之被选议员，半皆恶徒。……伪造民意，实行专制，酿成全国叛离，外人瓜分之祸。缘此推之，亡国之兆已崩，若再以武力平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以有限之兵力，从事内争，置外患于不顾，是对敌国宁可屈服，对国人毫无迁就，重轻倒置。”

“我国内争年余，所有军用各款，纯由抵押借债而来，用借款以残同种，是何异饮鸩止渴，借剑杀人，长此已往，恐未罢同室之戈，已堕渔人之网。”“以上各项理由，各军师旅长俱表同意”。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吴与二谭一莫签订了《救国同盟军草约》正条四则、附带三则十节，既是对皖系的军事“攻守同盟”，又主旨在对外——一致作外交后盾，“同仇敌愆”，“以洗国耻，而为东亚吐气。”③

一九二〇年初，吴佩孚以“久戎疲劳”为由，电请北洋政府准其撤防北归，而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则以“拖”字相敷衍。三月二十一日，曹錕连转吴佩孚急于撤防的缘由说：“众心怦怦，万难支持；归意勃勃，沛然莫御。……湘督（张敬尧）所部之兵力，接收我军防地，足敷分布。”④五月中旬，吴佩孚悍然违抗段祺瑞不准撤防令，接受广州军政府“津贴六十万元”为开拔费⑤，从前线撤军北归，以“交换防地”“为内幕”⑥“吴师朝发而谭（延闓）军夕来。”⑦吴师撤退，使张敬尧所部完全孤立，在湘军和广大农民武装力量面前，十万之师受到毁灭性打击，“节节失败”、“毫无应策”，⑧溃不成军，湖南人民乘势除一大害。驱张运动是湖南人民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反军阀斗争，对湖南和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起了巨大鼓舞作用，并有利于中国人民在巴黎和会上伸张正义，力争主权的斗争。

吴佩孚“罢战主和”、“撤防北归”，即意味着直皖之战的开始。因为吴师驻防衡阳，可作北洋军阀集团统治北方的“南天柱石”而无与为敌者。现在，吴师“撤防北归”，等于敞开南大门，南军随时可以进取，使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彻底破产；而吴师北归布防于直、豫、鄂各军事要隘，直接形成对皖系生存的极大威胁，吴佩孚已摆开倒皖决战阵势，故吴师撤防，直皖之役，势在必行。⑨孙中山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发动了粤桂战争，重建了军政府。

二、吴佩孚与赵恒惕

湖南在驱张运动胜利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想利用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来改造和建设新湖南的新局面；而谭氏也想利用人民革命的力量以实现其脱离南北夹击，名曰“湘人治湘”、“湖南自治”——实为“以假乱真”而又“弄假成真”的结果——湖南颁布了省宪、民选了省长。

但不久发生了孙中山、程潜倒谭事件。国民党驻湘军人联络谭派健将王育寅、林修梅等在湘西通电反谭，“先使谭氏不能展布。”^⑩接着再发生谭之心腹肖昌炽被所部哗变杀害事件。谭被迫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野，推荐手下师长赴恒惕为湘军总司令。

赵比谭果断，力排众议，继承“自治”之路，断然由省政府成立制宪筹备处，采取简易程序，起草、审查、投票、公布了《湖南省宪法》，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正式公布施行。

湖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唯一实行省宪的省份，号称“模范省”。虽非毫无意义，确未给湖南人民带来福音。

赴恒惕从此做了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和广东国民党新军阀陈炯明的“桥梁”。陈炯明为反对孙中山而割据自雄，以谋“联治”自保，需要联络赵；而吴佩孚对抗孙中山北伐和反对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即粤、奉、皖“三角联盟”便大唱“西南联防”，更需要收买赵。赵恒惕的地位，“确实也是靠陈、吴才得保持，所以陈、吴支配力可直达于湖南。这就是湖南省的‘自治’”！^⑪

湖南自治，俨然成为一个“湖南国”，它使或南或北均不敢贸然图湘。孙中山受陈炯明的牵制，而吴佩孚发动直皖之役的前提条件就是与湘军修好。陈炯明与赵恒惕相争“联省自治”运动的“盟主”，貌合神离；而吴佩孚则始终抱定“统一全国”的政治野心而必然坚决反对陈、赵的“联省自治”运动。这一点，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不可调和并不断加深的。

一九二一年夏，湖北的驱王（占元）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省自治”潮流的发展。但吴佩孚不惜以强大武装力量镇压了鄂省的自治运动，使“联省自治”运动开始消沉。

吴佩孚在《复蒋作宾、孔庚电》中宣称：“诸君主张自治，鄙人亦酷爱和平，两湖本是一家，孰非国家领土，苟以大局为念，无事不可曲商，若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某虽不敏，窃为不取。”^⑫

赵恒惕率湘军援助蒋作宾、孔庚等发起的湖北自治战争，并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于武汉，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问题，还特邀吴佩孚参加，以便组成全国“联省自治政府”——即抛弃南北两政府——另立第三政府。吴佩孚因曾主张过建立第三政府之说，现地位变了，以沉默不复，表示反对。

与此同时，陈炯明亦电请浙督卢永祥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议定全国“自治大法”。

以上，均因湘、川、鄂在吴佩孚大规模“援鄂战争”中被一一击败，而吴氏又以战胜者之余威宣传召集所谓“庐山国是会议”，从而破坏了汉口会议和上海会议，而“庐山国是会议”亦照例流产。吴佩孚因连续战胜皖系、湘、川、鄂

和奉系，“军威大张”，迷信“武力万能”，故他扬言：“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⑬他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海黄。”^⑭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即在吴佩孚援鄂战争胜利后，他电阻赵恒惕就任湖南省长（全国第一任“民选省长”），扬言：“老弟正式就职之日，即中央下令讨伐之时。”^⑮赵氏未能从命，仍就省长要职。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处世圆滑的赵恒惕首鼠两端，一面通电坚持“联省自治”主张，继续鼓吹“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家”^⑯；一面又表示拥戴吴佩孚的傀儡总统黎元洪复位，支持吴氏所谓“法统重光”，愿将各省宪法大纲纳入所谓北洋政府的“国宪之中”，^⑰即愿与吴妥协。赵氏并发表一篇题为《与曹吴论国是书》，洋洋数千言，反复阐明联邦化精神与作用，提出：“一面尊重国会，一面开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将国宪上之要点决定大纲”之后，“再由国会据以制宪”，最终实现“联邦化的统一。”^⑱

对此，吴佩孚大加驳斥他这位“奖午老弟”并威胁道：“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像这种人简直不可与强中国的国民性”。现在，“中央所以无统驭之能力，良由各省之各自为政。武人据地称兵，残民以逞；政客挑拨煽动，党派分歧，延至今日。……谁若毁法乱政，必有负其责者弃。”^⑲

这样，湖南及全国的“联治派”中坚分子，多趋向于维系中国传统的统一局面，接受了吴佩孚鼓吹的“先国后省”论，抛弃了“联邦论”。他们认为，吴佩孚既击败了皖系、奉系、新旧交通系，完全有资格结束中国分崩离析的政局，他是统一中国的“大救星”，甚至有人吹捧“吴佩孚有做华

盛顿的希望。“⑳政局、潮流为之一变，“联省自治”运动顿时一落千丈。

一九二二年七月，黎元洪下令“尊重地方自治”。八月，旧国会通过省之事权，应取概括主义，中央取列举主义，各省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等。湖南赵恒惕首先响应，宣布：“取消自治”，“实行北附，”㉑吴与赵，言归于好。

三、吴佩孚与陈炯明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正是北方直皖矛盾日益尖锐之时。孙中山利用这种形势，积极联合皖系，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直系吴佩孚，进而推倒桂系、打开国民革命的新局面。他表示：“如段（祺瑞）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当引为同志。”㉒朱执信说：“与段的合作已有头绪。”㉓此后，陈炯明的粤军与皖系闽督李厚基达成了停战议和并交换了条件。“李拨子弹”给陈，“所有作战计划及接防事宜，皆如李所要求”。㉔这使吴佩孚与桂系的勾结更加紧密。

吴佩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四日发动直皖战争，孙中山于八月十六日指导陈炯明粤军回粤讨桂，即发动粤桂战争，孙、吴均是胜利者。十月二十四日，陆荣廷、岑春宣通电撤销广东军政府，实行北附；㉕段祺瑞于七月十九日引咎下野。

战后，南北政局开始了重新组合。北方是直系曹锟与奉系张作霖“平分春色”，吴佩孚步段祺瑞后尘，实行“武力

统一”。南方是孙中山重建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力加阻挠和反对；孙中山主张北伐，而陈炯明则力谋“联治自保”，与孙中山的北伐统一相对抗。为此，陈炯明外则联络湘赵、闽李、浙卢、滇唐、赣陈、直吴，内则除邓铿、许崇智外，嗾使汪精卫、蒋介石及粤军将领持反孙态度。

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孙中山派蒋介石赴桂林与皖系代表徐树铮会谈联合反直问题。“孙、段、张的三角联盟，以为对付曹锟、吴佩孚的前举”。②⑥

为了破坏和抵抚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吴佩孚先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汉口召集鄂、皖、湘、赣、苏五省代表开长江“联防会议”，讨论抵御广东之北伐和粤皖奉之“三角联盟”。十二月，吴佩孚再与湖南赵恒惕订立密约，防止孙中山北伐军入湘攻鄂，并急派代表赴粤与陈炯明勾结，掣时北伐。接着，再派专使黄申芑抵粤与陈炯明进一步会谈，双方实行暗中结合。陈并与赵结成反孙联盟，由赵阻止孙中山北伐军取道湖南，而陈则从背后加以牵制。孙中山事后说：“综观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②⑦

吴陈会谈在“裁兵”、“废督”问题取得一致，而在陈主“联省自治”和吴行“武力统一”问题上存在矛盾。但在共同反对孙中山这一点上却利害相关。

所以，吴与陈在孙中山的北伐军入赣时，几乎已签订了某种意义的“攻守同盟”条约。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一面令所部四千人围攻和轰击总统府及孙中山住处“粤秀楼”；一面派兵北江遏止北伐军还师的归路。而吴佩孚则派江西的北军节节追

迫北伐军，致使北伐军受两面夹击，无路可走，国民党无立锥之地。

当北伐军入赣，陈炯明叛变之前，遭受攻击恐惧者，吴过于陈，陈处助吴地位，而吴处求援于陈地位。所以，陈炯明叛变，无异是替吴出了一次死力——使吴佩孚取得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

孙陈龃龉，早已暴露。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曾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吴佩孚，利用联吴来切断吴陈勾结，而在对待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等西南新旧军阀的“联省自治”问题上，孙、吴在表面的理由和态度上似极其一致。

蒋介石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中说：在赴沪途中，孙中山认为“联省自治”的祸害，是“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各省“借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②

陈炯明失败后，孙中山一方面不放弃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另一方面他深知北方当局在洛吴，一时“孙吴联合”的舆论甚强。孙特派王宠惠与吴密谈合作问题，吴欣然同意接受王氏出组新阁的要求，成立了所谓“好人政府”。孙氏亲信即吴氏幕僚孙丹林是“孙吴合作”的“中间人”。这种“合作”因缺乏政治、思想基础终成泡影。

四、吴佩孚与杨森

一九二一年七月至十月爆发的湘、川援鄂战争，是南北军阀间一次重要战争。它以湖南赵恒惕“援助鄂省自治”为发端；以洛阳吴佩孚扫除“统一障碍”为借口，派大兵侵鄂夺得该省地盘为结局；川军纯系趁火打劫，转移川军内部矛

盾，以湖北为外府，夺取西南鸦片集散地和川盐销售地——宜昌为目的。在宜武兵变之后，川军便蠢蠢欲动，大有移兵驻宜之势。

是年七月，川军将领推戴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杨森所部第九师占有川南和上川以东富庶地区，标榜“建设新川南”，野心独霸全川、称雄西南。

八月十九日，刘湘宣布参加“援鄂战争”，声明三大理由：（一）使鄂人永远免于战祸；须扶助该省之自治；（二）为完成四川自治，须扶助鄂省之自治；（三）为免全国分裂之虞，须促成联省自治。^{②9}

但这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川、鄂实际存在的问题是“川盐楚岸”问题，即湖北境内的食盐以宜昌为销售中心；而上五府地区均划为川盐的销售区域。可是王占元曾以成本较低的淮盐运销上五府区，这就挤掉了川盐的销售市场。

川盐非同一般商品。它对川军的重要性，如同原川督刘存厚所说：“川中财富罗掘已穷，以后放响，端赖盐款，稽查总所开放楚岸，……不惟军饷之穷，何以奠定民生？”^{③0}

二十二日，川军大举出动“援鄂”时，吴佩孚与赵恒惕谈判，一场大战争，说是“误会”，化干戈为玉帛了。川军闭塞，仍逼进宜昌。

杨森部未被“录用”，因暗与吴佩孚通款曲。而吴佩孚北军战胜湘军后，便立即挥戈西指，吴调集大军增援宜昌。计有：吴亲率之第三师一部分，张福来第二十四师，靳云鹗第八混成旅，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王汝勤第二师一部分，共九旅之众，与攻鄂川军旗鼓相当。

九月一日，川军唐式遵部从北岸发起总攻。四日，刘伯

承率一支队经数日激战全歼南岸守军。但驻宜昌英、美、日三国领事以保护侨商为名，出面调停，川军一度被迫停止进攻，为吴佩孚作了缓兵之助。

下旬，吴佩孚在海军舰队“湖鄂”、“楚国”、“楚泰”号配合下，向川军反扑过来，川军不能支，放弃宜昌，退守珠宝山、巴东、秭归一带。而吴佩孚因川军所处地势多属高山，不敢穷追。故双方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宜昌谈判议和，其条件中规定：“川盐销鄂问题，另定税则，由两省平均支配。”^{③①}二十七日，“川盐楚岸”开放。

川军“援鄂战争”失败，退回川境。但熊克武、刘湘等人相互推卸责任，展开火并。熊派求滇黔军入川应援；刘派（包括杨森）则请吴佩孚入川助战，彼此有恃无恐，川军内部混战、引虎入室，使川省无宁日。

至此，四川军阀传布的所谓“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③②}的誓言，“全部化为乌有”。川境再度陷入长期内战和南北之争的军事政治漩涡之中。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杨森在川军内战中兵败出川，被吴佩孚收留后部队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六师”，驻屯宜昌。从此，吴杨结为“莫逆之交”。

川军刘成勋、邓锡候为争夺地盘而战。第一军但懋辛，第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联合攻击邓锡候、陈国栋、田颂尧三师。

年底，吴佩孚乘川军内江之机，动用直、豫、鲁、鄂、陕五省兵力，大规模地进攻四川，以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吴令杨森打头阵，特派孙传芳率卢金山、孟昭月、张允明、赵荣华等旅，助杨回川驻防万县。

一九二三年一月，云南唐继尧与贵州刘显世联合进攻贵州另一派军阀袁祖铭，争夺黔省地盘。袁兵败而投吴，吴即令袁先弃黔而率部入川与杨森联合图川，胜利后再回师平黔，收复黔省政权。

二月十二日，吴佩孚令杨森、王汝勤、卢金山、赵荣华分任川军总司令、援川军总司令、副司令，由长江水路与利川、施南陆路西进，攻川理由为：西南军阀，“割据国土，糜烂地方”，故必须“削平潜伪，殄灭凶残，罪只独夫。”^③北军、杨森部、袁祖铭部曾一度攻入重庆。

三月二十九日，但懋辛通电揭露吴佩孚说：“近复阅吴佩孚致援川各将领蒸电（十日），始知此次用兵，确为吴氏主谋，而电中竟有熊克武、但懋辛割据国土，潜凶伪残等语。……查吴氏图川之说，酝酿已非朝夕，是役之兴，纯由洛阳祸始，命令不传于府院。”^④

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杨森攻占成都。五月二十七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按吴佩孚意见，特任杨森为川督（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但至六月底，吴佩孚“武力统一全川”计划遭到惨败。

唐继尧一面联络熊克武、刘显世组成川、滇、黔“靖国联军”，出战袁祖铭的“复黔军”和吴佩孚所派之于学忠、宋大霏、唐式遵、李越森等北军及川军；一面与川滇边防督办刘湘勾结，“专对袁（祖铭）、北（吴佩孚）、……铲除内患，贯彻‘联治’主旨”、“互相协助”。^⑤

由于袁祖铭与刘湘步调不一，“复黔军”与“定滇军”矛盾百出，“复黔军”遂撤退在川黔边界，吴佩孚“援川”

与“统一全川”计划破灭。

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兵败南逃，于一九二五年夏，游离于鄂、豫交界之鸡公山，投宿于河南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的别墅。北洋政府段祺瑞临时执政，是日电令驻防开封之胡景翼、孙岳，湖北之萧耀南（已投段）等，彻底消灭吴氏这一心腹大患。是杨森、赵恒惕“以大义支持”^⑳吴佩孚，使其由一只“死老虎”一跃而成为“十四省联军讨贼总司令”^㉑，出山后之吴佩孚设总部于汉口查家墩，仍设“八大处”，以蒋方震为行军参议，张其铤为秘书长，其规模、声势并不减于当年开府洛阳威风。但政治上已无号召力、军事上皆乌合之众。今日之吴佩孚，“与其谓为号召直系诸将，无宁谓受诸将之利用。江浙之事，孙传芳为政，无论今后，要知非吴力所可预闻。其他如鄂、豫、皖诸省萧耀南、方本仁、邓如琢等亦各有用心，吴在事实上，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终将为傀儡而已”。^㉒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间，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全军复没，仅以身免。这一风云一时人物、成为走投无路的“天涯逋逃客”。

其时，吴氏一度伤心绝望，几欲入山披剃、落发为僧。他在四面楚歌的关头，决定投奔杨森。杨亦为报“知迂之恩”、贸然准其入川。

吴佩孚入川，等待时局一旦有变，可策动四川军阀拥戴自己，角逐中原，进叩秦关。但因杨森时已就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昔日之友遂成今日之敌。而蒋介石国民政府亦有明令通缉吴佩孚。川省内部正值群雄割据、吴入川活动定召大乱。